



HANYU RENWEN JINGSHEN LUN

汉语人文精神论

申小龙著

中華書局

语言学书系

HANYURENWEN JINGSHENLUN

汉语人文精神论

申小龙 著

辽

辽宁教育出版社

当代大学书林
汉语人文精神论
申小龙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87,000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 插页: 4

印数: 1—1,5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王之江

责任校对: 李笑 王淑芬

装帧设计: 安今生 安迪

ISBN 7-5382-0930-1/C·42

定 价: 4.90元



申小龙，1952年生，上海人，祖籍浙江杭州。复旦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研究所语言学博士，兼任江西大学语言研究所名誉研究员。1978年初考入复旦大学中文系汉语专业，先后获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88年初毕业，留校任教。已发表论著一百二十篇(部)，获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优秀学术成果特等奖。现任全国汉语史研究会会长、中国文学语言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文化语言学丛书主编。

编辑序语

近年来，出版界丛书热风吹遍大江南北，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一套套丛书接踵而至，这种趋势已成为引人瞩目的当代意识流。《当代大学书林》，也是在这块文化温床上破土而出，并将以自己的特色，跻身于丛书之林。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常迅速，现代通讯设备已将信息的传播推向崭新的阶段。由此，地 球变得狭小了。如果说在古代，闭关锁国还可以生存，那么在今天，一个国家如果断绝同外界的一切联系，那将成为神话了。

在我国的封建时代，曾有几个王朝对外开放，使中华民族的文明传向世界，对人类的进步作出伟大的贡献。本世纪初，五四运动的先哲们，打破了近百年的沉寂，把西方的先进思想引入中国。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经过几十年的艰苦奋斗，建立了面貌一新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中国人民掌握了先进的世界观和优越的社会制度，我们本可以发扬五四精神，保持同世界的联系，以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去赢得世界。非常遗憾，“左”的错误和各种历史因素使我们自己关上了门。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世界在我们面前展现了五光十色的图景。在改革、开放的十

年来，我们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巨大成就。在这样令人鼓舞的背景下，以传播新思想、积累科学文化成果为己任的我国出版界，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今天，我们有更加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器，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有丰富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有十年的卓有成效的实践，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建立社会主义的、中华民族的、富有生命力的新的文化体系的时候来到了！

党的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从根本上说，科技的发展，经济的振兴，乃至整个社会的进步，都取决于劳动者素质的提高和大量合格人才的培养。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们认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兴旺发达，都与其教育事业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其中，高等教育的规模、水平、面貌，常常反映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科学文化的发展轨迹。

作为一个地方教育出版社，我们首先要为基础教育和普及教育服务。同时，我们愿意为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奉献一点绵薄之力。正是出于这种职业责任心，我们确定了《当代大学书林》的出版计划。

《当代大学书林》，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百花齐放”、“古为今用”、“洋为今用”为方针，有选择地介绍当代中外思想文化领域里的新知识、新学科、新观点、新信息，力图在介绍世界文化发展新趋势的基础上，通过比较、鉴别，融入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继而逐步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文化体

系。我们愿意为此而竭诚努力。

《当代大学书林》，要把那些卓有见地、敢于创新的思想文化研究成果纳入“书林”之中，并真诚地推荐给高等院校广大师生，以期在大学的“选修课”、“专题课”、“系列讲座”的教学中留下“书林”的踪迹，这将是我们极感欣慰的憧憬。

《当代大学书林》，是一套综合性丛书，涉及政治、经济、哲学、美学、法学、史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史、宗教哲学、科学哲学、艺术规律研究等广泛领域。以大专学生、研究生以及自学青年为主要对象，同时也面向广大社会读者。

《当代大学书林》，以学术研究著作为主体，也适当选入部分译著。对于西方文化的各种思潮、各种流派、各种观点，我们的态度是：有益的，借鉴；有害的，批判。五光十色的世界，并不都是金子在闪光，西方文化中的糟粕是我们要坚决剔除的。所谓“西方文化热”，不过是历史的暂时现象，我们感兴趣的是，要以科学的态度，求实的精神，不懈的努力，重建东方文明，振兴中华民族的文化伟业。只有这样我们才无愧于当今时代，无愧于我们的祖先。

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蓬勃发展，我国的教育事业必将同步前进。《当代大学书林》愿做教育大军中的一个小卒，贡献我们应尽的力量。

不树桃李树书林，辛勤耕耘也成荫。愿我们的作者、编辑和广大读者互相支持、通力合作。同时，热切盼望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正。

《当代大学书林》编辑委员会

主 编

贾非贤

第二批丛书执行编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之江 安今生 陈 弼 俞晓群 贾非贤

特约编委

王 前	朱水林	冬 风	刘大基	张 锦
周 山	张志孚	陈学明	张相轮	张鸿雁
孟宪忠	胡守钧	陆杰荣	魏中军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语言学之变迁	1
第一节	晚清维新派的语文宪章——《马氏文通》	2
第二节	欧化文的大雅之堂——白话文运动	7
第三节	汉字的“泰西”归宿——拉丁化	12
第四节	人文淡化的酸果——科学主义	21
第二章	中国语文研究的人文主义传统	37
第一节	汉语实词研究传统	38
第二节	汉语虚词研究传统	52
第三节	汉语句法研究传统	58
第四节	汉语训诂的研究传统	72
第五节	汉语学者语言哲学的民族性	96
第三章	中国语言中的文化积淀	131
第一节	汉语与民族思维的互为观照	132
第二节	汉语与民族艺术的文化通约	148
第三节	汉语作为中国社会历史的镜象	159
第四章	汉语句型与民族语言心理视点	175
第一节	焦点视与散点视	177
第二节	“主谓”视与非“主谓”视	185
第三节	单域视与双域视	189
第四节	层视与核视	193

第五章	主题与中西语言结构的深层差异	203
第一节	西方语言逻辑的二元统一观	203
第二节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汉语主题的扭曲变形	207
第三节	“三分天下，鼎足而居” ——汉语主题的功能框架	219
第四节	主题句研究的语言类型学意义	226
第六章	汉民族时空观与汉语铺排律	241
第一节	汉语句子组织的心理时间流	241
第二节	施事句——汉语动态造句的典型流程	248
第三节	主题句——汉语静态造句的环状辐射	261
第七章	文化通观下的汉语语法本体论	305
第一节	汉语之弹性实体	306
第二节	汉语之流块建构	311
第三节	汉语之神摄方法	316
第八章	新技术革命与汉语语言学	329
第一节	信息时代与汉语规范化	329
第二节	汉字改革的科学性与民族性	340
第三节	我国新技术革命的语言决策	351
第九章	历史性的反拨：中国文化语言学	358
第一节	汉语的人文性与中国文化语言学	358

目 录

3

第二节 中国文化语言学方法论	381
后记	400
英文目录	403

第一章 文化断层与中国现代 语言学之变迁

一个民族的维系有种种条件。其中重要的一条，是该民族的文化心理认同。而作为这种认同的主要表征，则是民族语言。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民族语言是民族文化的形式。”^① 语言科学是整个人类文化研究的带头科学。作为我国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和指导思想的经学几乎包括了整个中国古代文化的全部内容，而经学研究的主要手段正是语言文字的考证和训释。当近代中国传统发生危机的时候，首当其冲的也是阐释封建文化之“道”的利“器”——传统小学。在除旧布新、新旧纠缠的文化震荡之中，从传统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文化断层也在历史地形成。这一断层在初具规模的30年代曾引起语言学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研讨，而在随之而来的西方现代语言学理论体系潮水般涌入，著述蜂出之时，这一断裂立刻被义无返顾地作为一个无可争议的历史新层面，在它上面迅速搭起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恢宏的脚手架。由此产生的新的历史惯性竟使人们在半个世纪中汲汲于圆说西方语言理论概念体系，直至将汉语分析的一个个基本领域逼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以至于叹息“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之时，仍无意对脚下的文化断层作出已经过迟的反

省。直到70年代后期以来开始现代化的进程，中国文化在与世界其他工业文明的文化的比较、冲突和交融中重新得到评价和检讨，近百年来中西文化交汇的建树及其酸果才有了一个重新认识和“回首”的机会。汉语语言学界正在意识到，汉语研究的现代化与中国的现代化一样，要到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根据，而不是到西方的菩提树上去摘下一串现成的果子。传统文化对于中国现代语言科学既是沉重的包袱，更是巨大的财富。离开了这个基础，中国现代语言学就没有立足之地。这就是文化断层之于中国语文现代化的深刻底蕴。

第一节 晚清维新派的语文宪章 ——《马氏文通》

在中国现代语言学史上，《马氏文通》一直被认为是奠定中国现代语法学体系和方法的开山祖。如果说在传统小学有深厚积累的音韵学上有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因材料的明智和方法的“西化”而使汉语音韵研究别开生面，那么在此之前，晚清人士马建忠在用西方眼光看来几乎是毫无建树的汉语语法研究领域移植来印欧语言的整座“葛朗玛”（语法）大厦，则是语言学文化断层的第一座丰碑。从此奠定了整个汉语语法发展的基本格局。正因为《马氏文通》在现代语文革新上这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对它的剖析有助于我们从根本上反省中国现代语言学降生的历史根源。

《马氏文通》的作者马建忠是一个与洋务派关系很深而又比较激进的改良主义者。他通晓法文和拉丁文，早年作为我国第一个到欧洲学习社会科学的留学生到法

国留学，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一些新知。回国后，他是李鸿章手下的一名洋务干才。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加紧，尤其是中法战争后严重的民族危机，马建忠深感靠洋务运动不能使中国获得中兴。他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富民是富国的基础和前提。这一见解使他成为早期维新派的知名人物。经济上富国先富民的思想，反映在语文教育上就是要改变“吾国童年能读书者固少，读书而能文者又加少焉，能及时为文而以其余年讲道明理以备他日之用者，盖万无一焉”^②的局面。显然，马建忠是把语文作为载“道”明理之“器用”来看待的。这同早期维新派“中体西用”的口号有深刻的联系。维新派的主将王韬在当时就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③，主张以中学为“主”“体”，以西学为“辅”“用”。^④这种“形而上之为治平之本，形而下之即富强之术”的思想，在当时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它竖起维护“中体”的幡号，开了采纳西学之戒。它把明清以来西学东渐引起的“中西”这一对使封建士大夫十分敏感的矛盾范畴纳入中国传统哲学的“道”、“器”、“体”、“用”的互相对等的框架内，以文化上的折衷论推行维新变法的政治准则，以致“举国以为至言。”^⑤然而“西”戒一开，西方物质文明蜂拥而入，西学的内涵也不断扩展。马建忠不仅积极主张扶植民族工商业，发展对外贸易，借外资以兴建铁路、开发矿藏，而且提出“用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的口号。^⑥把西学的内涵由“末”延伸到“本”，显露出咄咄逼人的新的时代精神。1877年他在《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中直言不讳地指出西方国家的富强之本在于“学校建而志士目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

师诸大端皆其末焉也。”这就把“西用”的视野由物质文明直接拓向上层建筑的教育政治体制。这正是改良派区别于洋务派的革新抱负。马建忠正是怀着这种用“西体”改造“中体”的政治文化抱负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爰积十余年之勤求探讨”，成就中国语言学史上开天辟地的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的。在是书的序言中，马建忠痛斥传统的语文教学涉及文法之事“罔不曰此在神而明之耳，未可以言传也。”他质问道：“噫戏！此岂非循其当然而不求其所以然之蔽也哉！后生学者，将何考艺而问道焉！”他看到“泰西童子入学，循序而进，未及志学之年，而观书为文无不明习，而后视其性之所近，肆力于数度、格致、法律、性理诸学而专精焉”，因而对语文教育是富民强国之本深以为然。马氏认为：“华文之点画结构，视西学之切音虽难，而华文之字法句法，视西文之部分类别，且可以先后倒置以达其意度波澜者则易。西文本难也而易学如彼，华文本易也而难学如此者，则以西文有一定之规矩，学者可循序渐进而知所止境。华文经籍虽亦有规矩隐寓其中，特无有为之比拟而揭示之。”他因而断言中国落后愚昧的原因就在于“结绳而后，积四千余载之智慧材力，无不一一消磨于所以载道所以明理之文。而道无由载，理不暇明，以与夫达道明理之西人相角逐焉，其贤愚优劣有不待言矣。”以革新封建教育、政治制度为己任的马建忠把语言规律的揭示与否提到中西“贤愚优劣”之分的高度，其用心之处，正在于由“用”到“体”的反思。这一思想同严复的“中西古今”论如出一辙。实质上放弃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折衷观，而将中西文化放在人类共同发展历史阶段的两个低高不同的时代层次上。从中我

们不难理解马建忠何以如此虔诚地模仿整个拉丁文法来构筑汉语语法体系。而且他相信世界各民族“均是人也，天皆赋之以此心之所以能意，此意之所以能达之理”。他又“常探讨画革旁行诸国语言之源流，若希腊、若拉丁之文词而属比之，见其字别种而句同字，所以声其心而形其意者，皆有一定不易之律。而因以律吾经籍子史诸书，其大纲盖无不同”。^⑦这种信念也导源自西方逻辑语法将现成的范畴套用于各民族语言而不问其本身结构特点的思潮。“以洋人之本、谋华民之生”的抱负同西方唯理普遍语法的认识相拍合，马建忠便“因西文已有之规矩，于经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征繁引以论知华文义例之所在”，坚信“而后童蒙入塾能循是而学文焉，其成就之速必无逊于西人。”^⑧中国传统的虚字、句读释经之学就这样在具有时代责任感，自觉肩负起在思想文化领域披荆斩棘、拓荒播种任务的维新派手中戛然而止。代之而起的是面目全非的西方语言理论体系。《马氏文通》成了改良主义者急功近利的语文宪章。“文化断层”就这样形成了。

《马氏文通》出版以后，影响巨大。“一般人对于文法的认识是从 1898 年（清光绪二十四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出版之后开始的。”^⑨然而正因为它是文化断层上的产物，因而是书出版后二三十年中“‘忆了千千万，恨了千千万’，对《马氏文通》体系的千万亿恨缠结也就从这一部书的出版时候开始”。^⑩对《马氏文通》的西化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它的组织并不是把中国语文上所显现的一切辞例收集汇类，组织起来的。彻头彻尾只是用了西洋语文的组织做筛子，把中国语文筛了一道，单检搁在筛子上的东西做材料组织起来

的”。^⑩“中国文字与世界各国之文字有绝异者数点。……今使不研究国文所特有而第取西文所特有者一一模仿之，则削足适履，扞格难通。”^⑪出路何在？“欲矫其弊，惟有从独立的研究下手。”^⑫赞成《马氏文通》的人却反唇相稽：“几千年‘独立’的困难与流弊还不够使我们觉醒吗？我老实规劝那些高谈‘独立’文法的人，中国文法学的第一需要是取消‘独立’。”^⑬《马氏文通》的作者也针对批评意见说：“不学拉丁文法，就编不出这部文通来，恐怕至今还在虚字研究中摸索。”^⑭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在改革中如何对传统文化进行反省的问题。尤其令人深思的是，在《马氏文通》出版以后，人们一面批评《马氏文通》的模仿，一面却从《马氏文通》模仿印欧系诸语言的语法的立场上进一步后退，惟以英文语法为模范，使西化之风愈演愈烈。批评《马氏文通》十分激烈的陈承泽、杨树达等的语法著作虽有特点，但“倘将《马氏文通》体系放在眼前，和各部书的体系比较对照，那这几部书立刻就会聚作一团，面貌非常相似，除出小小的几点外，几乎完全相同，一眼就可以看出他们是至亲。”^⑮即使是企图对《马氏文通》全面修正的刘复，他的《中国文法通论》的研究方法仍是模仿斯威特的《新英语语法》。尤其是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在最大程度上照搬英文语法，完全淹没了汉语的特点。反对西化的却又更深地陷入西化，这种历史的“悖论”在当时是无法解释的。然而从今天考察文化断层的新观察系来看，模仿和反模仿的共同历史悲剧是没有从传统文化中寻找语文现代化的支撑点。因而他们构筑的现代化大厦是先天不足的。30年代文法革新讨论中，有识之士曾指出：汉语的文法研究，并非始